

城市化进程与打工文学

□李鲁平

关于打工文学有很多争议。这些争议最主要的是来自命名的,即“打工文学”这一概念是否具有科学性。讨论“打工文学”不能不谈“农民工”这个称谓或者概念,因为不管作者的身份如何,我们所说的“打工文学”的内容、题材都涉及“打工”、“务工”,这一点恐怕没有异议,而打工、务工的主体是“农民工”。

但“农民工”这个概念在字面上就是矛盾的。是“农民”?不是。是“工人”?也不是。这个概念用来指称,那些在户籍上仍然是农业户口,但大多数时间在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或者在工厂、企业从事生产的农民。据统计,可以纳入这个群体的人口数目接近3亿。

近几年,围绕天生就有矛盾的“农民工”称谓不断引发争议。从政府官员、学者、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到“农民工”自己,都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称谓提出异议。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工”这个称谓带有身份歧视,呼吁取消农民工这个称呼。持这一看法的人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当了工人,他就是工人,而且与其他工人一样,都是合同工、临时工。农民当了工人还称其为农民工就不合理,工人就是工人,怎么能叫农民工人呢。因此,可以直接称呼农民工为水泥工、电工、建筑工,等等,也就是按照他们从事职业的种类和系列来称呼他们。有的地方把农民工叫外来青工、外来务工人员、进城务工人员。一种看法是,农民工这个称呼没有歧视意味。这些人认为,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也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的消费群体。可以说“农民工”三个字准确概括了这个群体的身份特征,“农民”指的是身份,“工”则是谋生的手段,没有什么褒贬含义。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还有一种观点,既认为这个称呼不妥,也认为没有更合适的称呼可以取代。但同时,他们承认,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比如,农民工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没能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比如,农民工从事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却同工不同酬、同伤不同赔等。“农民

工”成了低收入、低福利、低保障、低权益的社会底层的代称。因此,“农民工”这一称谓的背后隐含着不公平。

尽管如此,我认为,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农民工”这个概念是合理的。如同上述有的人士认为,这个概念本身没有歧视的含义,相反准确概括了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现状。“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和客观现象,这一现象植根于中国的城乡二元化。也就是说,一天不完成城乡一体化,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这一现象依然存在。

回顾全球现代化的历程,18世纪从英国发端的工业革命,开启了西方城市化的进程。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1851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50%,率先进入城市化阶段。到1950年,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英国达到了79%的城市化水平。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美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为64.2%,德国为64.7%,加拿大为60.9%,法国为55.2%,瑞典为65.7%。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经过30年的发展,有关专家估计目前的城市化率是47%,显然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过程。按照这个速度,达到60%的城市化水平,至少也还需要20到30年。换一句话来说,要实现中国几亿农民工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劳动福利、工资报酬、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实现一体化,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农民工这一现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存在。

在这一背景下来看打工文学,我们就有了比较广阔的视野和胸怀。一个几亿人的社会群体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难道文学不应该关注吗?显然人们不会反对。人们难以接受的,或者说有疑惑的,是在文学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打工文学”的分类,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这一疑惑,就是“打工文学”何以成立。对比一下“知青文学”的情形。“知青”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中,持续过接近30年的时间

长度(当然,其社会影响远远超出这一时间长度),而农民工现象在当代的历史进程中注定将要保持更长的时间跨度,其社会影响也不言而喻。既然知青文学是可以接受的,打工文学何以不能接受?或许有人会以作者身份来质疑,毕竟从事知青文学的绝大多数作者是知青群体,而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还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但我们显然不能仅仅用作者的社会类别和阶层来界定文学现象。一个数量足够大的人群,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群,在城市化进程中将持续超过半个世纪的社会现象,他们的生活、生存、梦想、奋斗、痛苦、欢乐,一句话,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既是文学无法漠视和拒绝的,也是全社会应该关注和关心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关注几亿农民工的打工生涯和生活、反映和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为己任的打工文学,就是可以光明正大成立的,无论他们的作者是打工者自己还是职业的作家。因为这是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把打工文学称之为“底层叙事”,看似是美化了这一文学现象,让这一文学现象变得更文学,而实质上,这一概念更有歧视之嫌。打工者也好,老板也好,官员也好,在制度和法律上理应平等,谁是底层?谁是贵族?这一区分恰好违背了社会发展的逻辑。城市化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个人享受同等的市民或国民待遇。

近几年来,文学界已经注意到,在打工者中间,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相信这一趋势必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发展下去,毕竟每一个打工者都有自己的梦想和抒发内心的渴望。在文学界,一些职业作家和非职业作家,也写出了优秀的反映打工生活、打工题材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谓“底层叙事”的号召下,不少作品把关注的焦点还局限于打工的艰辛和苦难这一点上,而不是更广泛地关注到一个社会群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但同时,我们也读到不少优秀的、视野宽广的作品。这里仅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山西作家蒋

韵的《麦穗金黄》。在这个小说中,一个农村小姑娘在城市里租了一个门面当上了理发师,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有一天打烊的时候来了个小伙子要理发,要做一个像麦穗一样昂扬、金黄的发型,原来他要相亲。不久之后,又来了一位小伙子,请小姑娘出店理发,小姑娘开始拒绝,后来小伙子解释,是给自己的朋友理发,他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个发型,但遭遇车祸死了。就这样,小姑娘两次给同一个打工青年理发,一次是小伙子为了见女友,一次是小伙子遇到车祸身亡。每一次,小姑娘都做的极其认真,她要小伙子从发型上获得精神、获得自信、获得满足。小伙子从麦穗一样金黄的发型中获得的兴奋、信心、向往以及理发师为死后的小伙子再次打理出麦穗一样的发型,既让人心痛,也让人慰藉。心痛,是因为他们生活不易、又很容易满足,且仍怀理想,欣慰的是他们能按他们这一代人的方式相互对待、支撑并呈现出一种可贵的朴实与坚持。这是我在30年来关于打工或城市务工生活中读到的极其少见的作品。作品没有写打工生活的艰难、挫折、苦闷……但让每一个人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温暖。宋剑挺的《麻钱》也是值得一提的作品。它写到了苦难,讨薪的苦难。三对夫妻在一个砖厂打工,运送砖坯,把晒干的砖坯装套,把烧好的砖运出砖窑,不分白天黑夜,一个月仅能得到几百元报酬。但仅仅的几百元,整数只能用古老的铜板代替,只有零钱可以以现金的方式兑现。尽管每个月他们都祈求老板把铜板换成现金,但直到来年将近,手中捏着的仍然是铜板。作品把砖厂超负荷的劳动与恶劣的劳动环境对照起来,并力图展示在这一环境下打工者的生存策略与人生理想。三对夫妻共睡一个炕,尴尬的夫妻生活,恶劣的饮食,低廉的报酬……即使如此,朴实的农民工每个月都在计算他们各自的目标还有多远。购买一个彩电、把茅草房改造成砖瓦房、买一辆三轮车,这就是三对夫妻分别的理想。作品的这一交叉叙述,丰富了对讨薪题材的内涵,立体描述了农民工的生存境遇。正因为作品不仅仅是关注农民工的讨薪历程和打工艰难,

这部作品才具有了如此的超越性。

另外一部值得一说的作品是山东作家东紫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农村女孩王小丫为了在都市找到立足之地,先后买过三个假文凭,从端盘子、打小工发展到自己开店,经济上一步步摆脱贫困,但她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城市人。她想到了通过婚姻来搭建进入都市生活的桥梁,于是走进了婚姻介绍所。都市男青年王安南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母亲自命不凡、清高独断、说话刻薄。作为大学教师的王安南一直没有得到晋升、没有分到住房,但他没有特别高的追求,只想找一个让自己幸福的老婆。在母亲的逼迫下,他也走进了婚姻介绍所。王小丫与王安南从迅速认识到恋爱、结婚。但一个侦破假文凭的案件,把王小丫的过去暴露了。王小丫多年的人生努力以及未来理想瞬间面临付之东流的危机。作品把一个农村女孩的苦心经营和脱胎换骨叙述得极富质感,没有渲染农村或者底层的苦难,而是尽量展现王小丫追求城市生活并用智慧和勤奋去实现理想的一面。王小丫需要文凭不是因为她没有能力,事实证明她有极大的创造力,而是社会需要文凭,是王安南母亲这样的瞧不起农村的知识女性需要文凭。王小丫的人生告诉我们,尽管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异乎寻常,但农民真正被城市接纳还有很多阻力,这种阻力既有体制的,也有文化和心理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再次证明了,农民工可以获得市民待遇、获得城市的接受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

农民工不是改变称谓就可以消失的现象,它需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从户籍管理开始,直到再没有由户籍规定的待遇区别,直到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国民,都享受同等的待遇。打工文学也不是底层叙事可以概括的。打工文学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城市化过程。这是一个复杂而博大的世界,作家既可以大有作为,也应该有所作为。无论是打工者自己书写自己,还是职业、业余作家来书写,打工群体、打工生活、打工世界,必将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中极为鲜明的一部分,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部分。

回归艺术教育的生命本质

□应丹

教育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是国家和历代文人关注和实践的重心。孟子将教育视作君子人生中的三乐,目的是为国家造就英才,因为天下英才关系着国家命运和民族兴衰。教育家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提到:“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不复论其类之善恶!”他把教育看成是恢复人性、改变素质的根本途径。余秋雨说:“教学,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化层面上的代代递交。”教育是一种时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教育的理解与需要的差异及所处时代的不同,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征。人们在深刻反思传统教育后,对教育的发展方向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回归现代教育的生命本质强调尊重生命特性,突出生命本性,探寻生命意义的教育价值取向,其中实现回归现代教育的生命本质最有效的途径便是艺术教育。艺术教育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生命教育,它调动了人对生命的感动力,鉴赏力,创造力,挖掘人在无意识层次上的生命潜力,使人成为更加完美合理的个体。

长期以来,艺术教育在实践中出现了异化的现象。艺术教育的生命本质所具有的独立性、完整性、创造性被艺术教育的非艺术化、功利化所禁锢。艺术教育的非艺术化主要表现在将艺术教育等同或附属与思想政治教育,认为“艺术教育”或“寓教于乐”的形式就是把艺术教育完全当作一种德育的媒介和手段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这种形式来实现德育(智育)的做法事实上是德育(智育)艺术化。蒋冰海指出:“倘若艺术在求真,那么牛顿的三大定律便是最好的艺术。如果艺术在求善,那么道德教科书便成了最好的艺术。但他们都不具备观照的愉悦,缺乏感性显眼的形式,并不是艺术。”前苏联的美学家斯托洛维奇说:“艺术的本质毕竟是审美的!”艺术教育的生命本质就属于

艺术教育的审美本质之中,不突出审美本质的艺术教育丧失了艺术教育生命本质的独立性、完整性和创造性,俨然已不是真正的艺术教育。无独有偶,艺术教育的功利化现象更令人堪忧。在许多现实情况中,家长督促子女接受艺术教育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考级”或依仗“特长生”升学,期盼艺术成绩在升学时加分而非提高艺术素养。一旦孩子的成绩出现滑落偏科等情况,家长便将孩子送去学艺术“谋出路”。专业院校的艺术教育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密集的艺术技巧训练期望艺术能够出“名”成“家”。结果导致学生在超纲、超量的技巧训练中忽视了艺术的“美”的学习和享受,忽视兴趣在艺术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缺失了艺术教育文化传递和发展价值。这种带着直接的功利目的不仅不能实现培养优秀艺术家的初衷,还抹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影响了学生健全和谐的发展。另一方面,学校也缺乏建立健全科学的艺术教育评价制度,学校艺术教育与社会脱节,与其他学科教育脱节,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实际需要脱节,往往是以得了多少奖项,拿了多少名次,为高一二级艺术学校输送了多少学生为评价标准。在这种片面性评价机制的导向下,艺术教育要么成为提高学校知名度的手段,要么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或消弱,成为学校功利意识的牺牲品。因此,我们应高度警惕艺术教育的非艺术化和功利化趋势,克服艺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回归艺术教育的本质属性,凸显其生命化价值。

艺术教育贯穿于人类生命的三个维度中,即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无论是自然生命、精神生命,还是社会生命都是人完整生命不可缺少的三个组成部分,它们各自独立却又相互依存、相互融通而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健全完整生命体。艺术与生命有着本质上的通合与联系,其个性、自主、创造、灵动的共同特性使二者互为促进、共同发展。艺术教育要顺应自然生命发展的规律,尊重生命本能与特征,回归其生命本质。只是为了传授艺术知识和技能而重

复机械地艺术训练,不但失去了生命在艺术活动中本能的感受、体验和创造,而且阻断了人类天性中所具有的艺术天赋和潜能。自主与创造是人区别于其他生命体最重要的特征。生命的超越性在于人的创造性,人们总是不满足于现有的状况而不断地去追求和超越,以实现自身不断的发展和突破。艺术教育是一种极具个性化和创造性的活动,艺术教育的生命本质就在于发挥生命的自主选择、自由创造的特性。长期的审美疲劳使学生失去对艺术的兴趣和美的追求,随着对艺术表现和创作的热情逐渐消失殆尽,学生的精神生命以及社会生命丧失也会在艺术活动中丧失自由释放和成熟的机会,从而慢慢滑向扭曲偏废的精神世界。根据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要本身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递进结构、层次系统,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要、爱和感情及归属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认识和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等。其中安全需要、爱和感情及归属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认识和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都是社会生命的需求。尤其是审美需要,它是人类社会生命需求的最高层次,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命追求和灵魂归宿。当人性中社会需求长期处于压抑或不能满足的状态,整个人性结构就会失去平衡,人性就会呈现出某种缺陷。艺术教育的任务不仅在于于审美教育,更在于它可以给人生不少安慰和趣味以解脱生活的苦闷,又可以补充科学的真,美化道德的善,有助于我们了解事物的真相,养成开阔胸襟的力量,以完善人性的品格,丰富和升华我们体会生命的内涵和深度。回归艺术教育的生命本质在于形成一种“自觉自由”的生活,体现为个体与社会秩序、自然规律的统一,人际的和谐,从而将以超越的态度现实地创造性地投入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界,实现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感性与管理性的多层次的融合统一。经过艺术陶冶的人具有欣赏和创造美的能力,建构真、善、美的艺术生命和艺术人生。

徐晨阳油画作品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绘画的态度——徐晨阳油画作品展”于8月3日至22日在北京美丽道国际艺术中心举行。此次展览展出了青年艺术家徐晨阳创作的数十幅不同风格的油画作品。

在徐晨阳看来,高速变化的社会处于一种新的“解构”的状态,但在变化中,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更需要坚持。在创作手法上,并不能单纯以“写实、写意”或者“具象、意象”这样的词汇来表述。绘画创作语言本身成为他绘画精神的象征。正如作者自己所言:“绘画是我的生存状态,体现

着我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态度。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绘画能够传达出这样的精神内核:宁静、宽和、优雅、内敛。它是东方的,从创作手法、绘画理念、审美趣味都与中国艺术传统有着血脉之连。”

美丽道一直致力推广优秀艺术家,多角度展现中国丰富的艺术生态,优秀的青年艺术家自然是其中重要的部分。此次展览标志著“美丽道青年艺术计划”的正式启动。该计划将坚持挑选那些兼具宽阔视野和文化积淀、并能准确表达自我感受的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展出。(王 昉)

「神华文学奖」颁奖

本报讯 首届“神华文学奖”近日在京颁奖,86部优秀参选作品的作者获奖。

“神华文学奖”由中国煤矿文联、中国煤矿作协、神华集团和阳光杂志社联合主办,是一项面向基层文学、激励职工创作的活动。来自煤矿工作一线的艺术爱好者积极参与,共有800多篇文学作品参与评奖。经过评委的认真评审,最终评出第一届“神华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其中,特等奖2名、一等奖9名、二等奖15名、三等奖30名,优秀奖奖30名。

该奖评委认为,这批获奖作品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来自基层,具有鲜活的生活气息;二是主题突出,讴歌了煤矿工人的奋斗精神。据悉,“神华文学奖”将每3年举办一届。

颁奖会上,三卷本的获奖作品丛书也同步首发。(于 吉)

2013中国国际沉香文化博览会举行

本报讯 8月9日至11日,2013(第二届)中国国际沉香文化博览会在京举行。此次博览会由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沉香保育委员会、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等联合主办,包括中国沉香特展、中国的艺术生活·徽州巨匠——当代艺术展等主题展览,旨在传承弘扬中国沉香文化,致力发展沉香保育事业,推动沉香产业的持续发展。

据介绍,沉香这一濒临消亡的珍贵物种现在亟需人们加以保护并进行可持续保育研究,沉香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沉香文化也需要传承和发展下去。在此背景下,中国沉香保育委员会应运而生。在博览会期间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沉香文化论坛暨沉香保育委员会成立会议上,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能让更多人进一步了解沉香知识,关注沉香资源现状,为推动中国沉香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王 昉)

本报讯 上海文艺出版社今夏推出红柯系列作品,包括描写故乡岐山的长篇小说《百鸟朝凤》,属于“天山系列”的《西去的骑手》《大河》《乌尔禾》(生命树),以及幽默历史小说《阿斗》。在这些作品中,有3部曾入围茅盾文学奖,《乌尔禾》曾入选国家部委重点译介工程。

据了解,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名家作品系列”之前曾推出莫言、韩少功、刘醒龙、格非、张承志、李洱等人的作品系列。红柯近年创作势头正旺,201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描写陕西关中西部小县城的长篇小说《好人难做》,2013年春节前后发表了描写陕西的短篇小说《手扶拖拉机》《环城高速》。最新长篇《骆驼访风暴》以西域大漠罕见的植物地精为引子讲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今年4月底由《收获·长篇专号》50周年纪念版发表,并入选中国作协重点项目。红柯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作品系列,对我有着极大的鼓舞作用。”(欣 闻)

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新拓展

□季洪华

在都市文化与文学的研究热潮中,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杨剑龙及其研究团队向来以敏锐的学术触角、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卓著的学术成就为学界同仁称道。新近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的“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研究丛书”,正是他们一次整体性的拓展与展示。丛书共八部,为《都市上海的发展与上海文化的嬗变》(杨剑龙等)、《上海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杨剑龙等)、《文学巨匠鲁迅与上海文化》(梁伟峰)、《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张登林)、《清末民初长篇小说上海叙事研究》(吴智斌)、《世界潮流中的海派文化与海派小说》(林雪飞)、《上海出版业与三十年代上海文学》(冉冉)、《上海文化与上海唯美主义文学思潮》(赵鹏)。

近年来,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借助文学想象的方式,已成为都市研究的一种有效方式。杨剑龙等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介入都市上海,与一般经由文学拓展至文化研究不同的是,“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研究丛书”主要运用“清明上河图式”的轴卷结构,以都市为轴心,以文化为经纬,从通俗文学、海派小说、清末民初长篇小说、唯美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左翼文学等方面扇形展开上海文学图卷,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中,拓展文学研究的疆域,深化都市文化研究的内涵,丰盈都市文学研究的血脉。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上海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五四”落潮以后,上海逐渐取代北京成为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中心,这主要得益于上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上海文化不仅制约和影响着上海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丛书以十分开阔的学术视野,从历史传承和现代版图中梳理分析上海都市文化语境的形成与特质,在东西文化语境中和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上深入探究。

学术研究向来既重“宏通”,尤贵“专精”。通观“丛书”,著者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在诸多方面丰富发展了上海文学的研究,填补了某些研究领域的空白。首先,精心择取最重要的“点”,“入乎其内”深入肯綮。譬如,关于自由主义文学、现代派文学、唯美主义文学、左翼思潮、通俗小说及上海时期的鲁迅等重要方面深入探讨。其次,在“入乎其内”时,善于做到“出乎其外”,不仅重视都市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联,而且尤其关注上海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譬如,从文学翻译、文学出版、文学运动、文学消费等方面探究上海文学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第三,在处理好“宏通”与“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做到论从史出、言必有据。譬如,在梳理“都市上海的发展和上海文化的嬗变”时,著者在考察吴越传统、西方移民、左翼革命、孤岛事变等的基础上,分析租界文化、通俗文化、左翼文化、孤岛文化、消费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等不同文化层面,从而得出结论:上海在历史的传承与现代的嬗变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性格,其中包括海纳百川的开放性,融会贯通的多元性,精致卓越的商业性。在探析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关系时,著者在考察文化史与文学史视域中市民文化与通俗小说的缘起流变的基础上,分析“言情”、“武侠”、“侦探”等通俗小说的叙事特征和审美接受,认为:市民文化孕育了言情、武侠、侦探等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通俗小说中与蕴含了诸多市民文化因子,通俗小说的娱乐性和消费性使其对现实采取了妥协与回避的态度,在艺术形式上继承的多、创新的少。在探究鲁迅与上海文化关系时,著者把鲁迅置于租界文化、海派文化和左翼文化三种亚文化交互中,考察都市上海之于鲁迅的影响以及鲁迅视野中的上海文化,最终得出结论:上海对于鲁迅其实是一个宿命,鲁迅后期的生命存在与文化成就,离开上海这块土地,是无法有效进行和完成的,鲁迅厌恶上海又依赖上海,是其纠缠于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情感之间,无法摆脱因窘境遇的真实反映。丛书中的这些论述和识见无不体现出著者厚实的理论涵养、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

该丛书的每位著者若无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作为立论的基础,细读文本,还原历史,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深入细致地进行文本分析、史实考证和理论概括,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个案和整体研究、感性体悟和理性思索相结合,综合运用文艺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努力做到论从史出,材料翔实,引证丰富,分析细致,论见精到。无论是在整体规模上,还是在纵深拓展方面,八卷本的“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研究丛书”都应该是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

红柯系列作品出版